

佛学与人文

学术文丛

禅宗以慧能南宗为主，兼及其他。本书着重考辨和厘定中晚唐禅宗地理，并解释形成这一时期禅宗地理规律的若干因果关系。

主编 刘泽亮

中晚唐禅宗地理考释

吴洲◎著



中晚唐禅宗 地理考释

吴洲◎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晚唐禅宗地理考释/吴洲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254-504-5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禅宗-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5340 号

中晚唐禅宗地理考释

吴洲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250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504-5

定 价: 48.00 元

佛学与人文学术文丛

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成果

厦门大学 211 工程三期建设成果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晚唐禅宗地理考辨 / 11

一、中晚唐禅宗各派法嗣简表 / 13

南岳系 / 14 天皇系 / 35 青原系 / 40 荷泽系 / 55

曹溪别支 / 60 北宗法嗣 / 62 保唐系 / 68 牛头宗 / 70

二、中晚唐南宗丛林地理的考辨 / 72

江西 / 73 湖南 / 81 南岳和庐阜 / 84 山南、荆南和鄂

岳 / 85 淮南、两浙和宣歙 / 88 福建和岭南 / 91

三、有关禅师籍贯的信息 / 100

四、禅师驻锡地的直接分布规律 / 103

五、乾符以降禅师驻锡地的特别辨析 / 106

第二章 中晚唐东南历史与地理的若干方面 / 109

一、自然地理和行政地理的若干问题 / 111

二、东南土著分布之区域 / 118

三、安史之乱引发的移民南迁潮 / 128

四、东南地区的两税方案 / 145

五、唐代的逃户问题及其地理 / 163

六、唐末东南地区的军阀混战 /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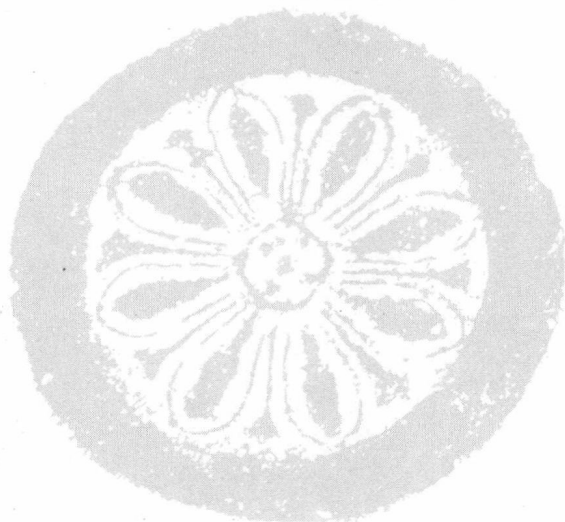
七、中国史上经济和人口重心向东南转移 / 189

第三章 中晚唐禅宗地理的深层解释	/ 195
一、中晚唐逃户问题与僧徒身份之关联	/ 197
二、盛唐中唐之际的马祖和慧公	/ 205
三、洪州禅、汾仰宗、曹洞宗和雪峰法脉	/ 211
四、禅宗丛林分布的间接暨深层规律	/ 222
五、禅宗丛林实为遁逃藪泽	/ 234
六、唐末禅宗地理特殊迹象的解释	/ 249
七、禅宗地理:拓荒时代的见证	/ 251

主要参考文献	/ 263
---------------	--------------

绪

论



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对其宗派特征,通常是立足于佛教思想史内部,指出它是标榜“见性成佛”、“教外别传”的流派,但很少有人探究禅宗和广泛的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本书通过对中唐禅宗地理之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展现当年禅宗丛林的分布状况和分布规律,并揭示丛林的分布状况与当时发生在全国、尤其发生在东南各地的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千丝万缕般的联系,而特别要揭示丛林的分布规律与甚嚣尘上的逃户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唐代开元盛世的持续时间是短促的,甚至都不足以横跨一个寿命较长点的唐人的一生。盛世的成立需要众缘和合,有很多隐藏的基础容易为人们——包括当事人和后来的窥探者——所忽略。人口迅猛增长在土地供应稳定或难以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破坏盛世的基础,和平安逸环境则会销蚀作为唐初政权基础之一的府兵制(这曾经是唐朝强盛的秘密之一)。① 难以为继和难以恢复的还包括租庸调法。中唐时,颇有见识的陆贽和算不上有见识的白居易,都曾对该法表示过某种对唐人而言近乎乡愁般的怀恋,但时代条件和历史地理的确已经变了。

在盛唐末期的天宝十三载(754),唐代中央政府主管人口和财政的户部,计算当年现管州县户口,即管郡 321,县 1538,乡 16829;户 9,069,154,②口 52,880,488。其在籍户、口,臻于或接近唐代鼎盛之数。③ 而此时,淮南、伏牛山以南、巫山、雪峰山以东、④五岭以北的南方主体区域的人口数字达到了 14,055,549。⑤ 只占

① 兵农结合的府兵制,须将、士合德,并二者皆有尚武精神,但这亟须实战磨炼,而在和平条件下缺的就是这项,所谓“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 戒边功也》)。

② 按《旧纪》原文作 9619254 户,课户、口与不课户、口分别合计数,与所录总户、口数不符,是明显的漏洞。《唐会要》卷八六记载当年户数为 9069154,与课、不课合计数更为接近,乃据以改。《南部新书》卷丙云:“天宝末,管户尚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又宋代笔记《侯鯖录》卷一天下生齿之数条所记唐极盛户数,亦作九百六万。是则《旧纪》舛误,明矣。

③ 户数最多,为天宝十三载,口数臻于极致,则推天宝十四载。

④ 此所言雪峰山,系就今湖南省境内山脉的今名言,非义存禅师所住之福州同名山。

⑤ 这是我根据《旧唐书·地理志》各州天宝口数做的统计。

26.58%，相较华北、关中，这里尚显得地旷人稀。^①

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中，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堪称历史的分水岭。若是根据这个年代划分唐代前期与后期，便各有137年和152年。后期便是所谓“中晚唐”。在该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叛变，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进犯。次月丁酉，陷占洛阳。次年六月，玄宗窜蜀。

很多人的命运都因为“安史叛乱”而改变：天宝十五载(756)，即肃宗至德元载，可以算作中唐的开始，这一年，杨贵妃吊死于马嵬驿。

这一年，杜甫四十五岁，避祸于鄜州三川县，闻肃宗即位，就算羸服也要坚持去谒见，却陷贼中，翌年脱去，终于得见皇帝，旋因疏救房琯(布衣时友)获罪，遂全然不受重用。因关辅大饥，更弃官去；尝客秦州等，自负薪采橡栗以给。困厄之中儿女饿殍者竟数人。甫后辗转流落于西川、峡中、荆楚间。客死湖湘，未亟归葬。^②

这一年，元结三十四岁。之前不久即天宝十三载，次山方擢进士第。而动乱爆发之际，应该就在他“守选”即等待被授予职事官的期间。不久之后即乾元元年，他率领汝州乡亲千余家(一说二百余家)，逃难至鄂州猗玗洞、江州灩溪一带。并在这过程中结识了在鄂州樊水上游蛇山一带传禅、且组织民众耕畚自给的惠公禅师。后来元结还担任过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等，是一位廉洁自持、体民疾苦、颇有官声的地方官，是动乱中的时代希望，也是让唐朝得以延续甚至稍具中兴之象的千百许中流砥柱之一。^③

这一年，马祖道一禅师五十岁，他可能已经由江西抚州的西里山，移至虔州龚公山，领众拓荒，耕作自给。到了大历二年，时任虔州刺史的裴谔对禅师礼敬有加，但是直到十六年以后即大历八年，道一得隶名洪州开元寺，他才获得了正

① 根据我的测算，当时华北与关中一带的人口密度，大体为东南岭北的2.6至4.2倍。东南最密的浙西润州83.7，常州81.5，最低的一类，如峡州2.63，潮州1.28，漳州1.50，汀州仅有0.47。这样的人口密度代表着怎样一种状况？如果我们拿它们来和现代各省区的数据进行比较，情形就会昭然若揭。今江苏省密度约为716口/Km²，浙江455、福建279、江西269、湖北333、湖南314、广东429(参见《中国地图集》文字资料部分)。都比唐代的相应部分高得多，甚至达百倍以上。唐时东南各地的密度，只能和今日某些位居雪域高原，或是遍布沙漠戈壁的西部省区相提并论，譬如西藏最是人烟稀少，为2.16万/Km²，青海6.83，新疆11.81，内蒙21.36，甘肃66.18。彼时润州等，仅跟宁夏87.88万/Km²不相上下。

② 参见《杜工部年谱》；两《唐书》本传；《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稹集》卷五六)等。

③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三等。

式的身份。接着他在洪州开法,信徒辐辏,簇拥门下,影响一时无两。而洪州正是元和间著籍户,在全国来说也算是罕见地有大幅增长的地区,即是移民涌入之所在。^①

这一年,后来为道一禅师撰写塔铭的权德舆还没有出生,而其父亲权皋在此前一年的早些时候,竟还是安禄山手下的一个县尉,但权皋洞悉禄山心迹,不耻为伍,那年竟利用诈死匿棺的手段逃逸而去。这年或这年的稍后,权氏家庭就跟无数的两京人士一样,逃难移徙至吴越、江西等地。在动荡迁移中德舆降生了,时间约为上元二年(761)。当权氏一家在杭州、洪州、润州等地漂泊的时候,德舆的祖母和父亲先后谢世,七岁他就跟母亲相依为命。虽然少时家境贫薄,幸赖母亲教导,早岁即得文名。中年以后仕途飞黄腾达。^②然而权氏家庭在安史之乱以后若干年内艰难的移民经历,恐怕正为无数移民家庭的典型写照。

从这一年开始,大量河南、西北等地的士人和平民,为了躲避战乱,向南——特别是向东南地区——迁移。从这之后的某一时刻开始,唐代人口聚居的重心已经落在了东南地区。

诗人白居易生在大历七年(772),卒于会昌六年,寿七十五,^③差不多完整经历了中唐时期,也超过唐代历史跨度的1/4。白氏一生名声与官位都不算小,可精神上很落拓,最后遁入释、老。^④建中元年至会昌末约65年间,乃是中晚唐秩序最稳定、经济—社会略呈繁荣之阶段,但却不能让敏感的心灵看到积极的方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考虑到佛教史的特点,本书所说“中唐”明确是指肃宗至德元载(756)至武宗会昌末(845)。会昌五年(845),废佛运动接近尾声,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应当是为了检得逃户和籍外田,以扩充税基。但是收效甚微,难救倒悬,只不过找了一只替罪羊,倒是对佛教为祸匪浅。此后唐廷的财政困境有增无已,且政治和社会危机四伏,应该可以根据这一年来划分中、晚唐。

乾符中(874-879)以黄巢标首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巢虽枭首,而唐廷遭此打击,完全是苟延残喘罢了。全国大部都陷入割据混战即剧烈动荡之中,几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之“盛唐中唐之际的马祖与惠公”。

② 有关权德舆家庭之移徙案例,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③ 参见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公墓碑铭》,《樊南文集详注》卷八;两《唐书》白居易本传等。

④ 如白氏《醉吟二首》有云:“空王百法学未得,蛇女丹砂烧即飞”,可窥一斑。

无寸土之宁。乾符以来约 33 年间,秩序全方位颠覆,是历史过渡的模糊地带。因而谈到在和平稳定环境下的制度变革及其带来的效应,大概只能以 120 年计。而南方地区经济上的初步崛起即人口和经济重心的转移,也只是这百余年内的事情。

而唐朝正朔的告终是在公元 907 年,就在次年,一代宗师雪峰义存禅师,示疾入灭,时间在夏五月二日夜十八刻,师春秋八十七,僧腊五十九。但在这之前他的弟子就已陆陆续续在各地分头传法了。按照《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两本灯录的传统说法,师系青原行思下第五世,所以如果要完整地研究中晚唐的禅宗世系并其地理,应该以大致平行的南岳下一至六世、青原下一至六世,以及北宗神秀座下第二世以下、牛头宗第五世以下等等的各种材料为对象。^①

从大多数南宗禅师的驻锡地暨南宗僧团的活跃区域来看,南宗的发展主要处于这样的范围:淮河、伏牛山一线(延及秦岭,即为地理学上习惯的南北分界线)以南,而又处在中国地势最低一级阶梯上的广泛区域。即囊括今日东南与中南各省的全部或大部。

倘若拿南北向的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及东西向的秦岭、淮河一线为区域划分之界线,则唐朝全境可分成四个区域:东南、西南、西北与华北。四大区域之间,均有明显的山川阻隔因素(包括在同属南方的西南与东南之间),自然地理特征大异;而且从唐代的历史来看,其余三区,均有绵延不绝之边患,或藩镇割据之弊端,惟有东南区域,大体无此等祸患和弊端,得以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向前发展。中晚唐时期,经济和人口重心向南转移,实际上主要是向此“大东南”区域转移,这开启了一个达千余年之久的社会经济史的大格局。

所以本书言及“东南”时,主要就是指“大东南”区域,而不局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如现在的江、浙、闽、粤诸省。故此“东南”对应之唐前期各“道”大致有:山南东、淮南、江南东、江南西、岭南(东部)。唐前期,“道”由起初仅为地理规划的概念,逐步成为准行政区划。中唐以来因行政建置变动,“道”之辖域缩小,总数变多,成为实质上的一级区划。在东南范围内,前、后期诸道名称、辖域或

^① 诚然,如贾晋华等先生所指出的(参见贾氏:《传世洪州禅文献考辨》,《文史》2010年第2辑),有关中唐禅宗的语录、灯史,其机缘语句不乏晚唐五代乃至北宋期间,杂糅增饰和伪造的成分。但语录灯史中涉及籍贯、卓锡地等类信息的生平简述之类,却出于传主弟子或善文僧人所撰之“行录”,故大体可信。

所辖州郡之差别,可表列如下(方括号内为前期非属东南诸道之州名):^①

表 0-1 唐代东南各主要道、州名称

前期道名	后期道名	后期各道所辖州域
山南东道(除澧、朗)	山南东	襄州、邓州、唐州、隋州、均州、房州、郢州、复州
	荆南	荆州、峡州、归州、夔州、万州、忠州、涪州、澧州、朗州
淮南道(除鄂、岳、蔡)	淮南	扬州、楚州、滁州、和州、寿州、庐州、舒州、濠州
	淮西	[蔡州]、光州、申州
	鄂岳	鄂州、沔州、岳州、蕲州、黄州、安州
江南东道(含歙)	浙西	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
	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衢州、处州、台州、温州
	福建	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
江南西道(除歙、连;含鄂、岳、澧、朗)	宣歙	宣州、歙州、池州
	江南西	洪州、江州、饶州、信州、吉州、袁州、抚州、虔州
	湖南	潭州、衡州、邵州、永州、道州、郴州、连州
岭南道(含连)	岭南	广州、韶州、循州、潮州、康州、泷州、药州、端州、新州、封州、潘州、春州、罗州、辩州、高州、雷州等

的确,中唐以来发生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不可逆过程,这是由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促成的:战略形势所迫;南方广大地区在唐前期仍然地旷人稀,具有容纳移民和逃户的潜力。但财政、赋役制度上的困境和“钱重物轻”这样的通货紧缩,始终伴随着这个过程。同时,山川形势和交通格局,甚至其他技术因素,限制了南方核心经济区的辐射力,并使广大南方地区缺乏社

^① 前期各“道”属州之分布,参见两《唐书·地理志》、《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凡有歧出,多依《旧志》为定。按,濠州旧属淮南,贞元三年(787)、元和二年(807)两度划归徐泗辖区,随后固定下来,此可参见《新唐书·方镇表》等。而蔡州是在淮北,旧属河南道。前期,《唐六典》卷三将连州划入岭南,《旧唐书·地理志》入江南西道,此从《六典》。

会—经济体系上的完整性。

禅宗地理和逃户问题,是本书探讨的一个焦点,其间的联系也是把唐代禅宗与南方史地两大论题紧密结合的纽带。滥觞于武周、泛滥于盛唐、延续并登峰造极于中唐,烂熟于晚唐的逃户现象,是贯穿一代的严重社会问题。禅宗丛林在庇护逃户方面着实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禅宗丛林的地理分布等方面留下了若干重要线索:

(一)禅林分布区域和低密度的战争移民迁入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

(二)禅林分布区域和南方土著分布区域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

(三)山林佛教特征明显,禅徒聚居处多系荒僻深隐之地;

(四)又有相当多的禅林位于州界毗邻、勘界模糊之处;

(五)禅林密布诸州屡有检括逃户之记载,而禅籍中亦有逃户依附之蛛丝马迹。

安史之乱造成的战争移民,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不得不面临迁入地的土地资源先已被占及生活日益贫困化的事实,沦为浮寄佃客甚或拓荒山林之逃户,是等待他们的命运。纯粹夷区罕有战争移民或逃户的记录,原因是多方面的:炎热瘴疠,条件更加艰苦,土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习俗的差异,均造成一定的阻碍。

建中初所定两税,既不能揭示某些地方的税额的合理限度,也不能正确反映另一些地方全部户口的纳税潜力,这便有了元额旧重之区与旧轻之区的分化。在前者,由“摊逃”日益引发的逃亡,照理应该是累积起来的中、长距离迁移。禅宗山林的分布,由山南、荆南向南渐趋壮大,并在江西与湖南臻于极盛,浙东、宣歙、福建亦有分布。这大致便是唐两京等北方地区逃户不断向南迁移的轨迹。跟这些长距离的逃户一起汇入浮逃行列,还有大量江淮间的贫农。

在唐代的山南、江南与淮南等道,均有检括或招携大量逃户的记录,但这些州郡彼此间经常存在多向而非单向的逃户流动。禅林与逃户分布的高度重合,只能有一个解释:禅林依附了不少的逃户。唐代诏敕屡屡提及诸州百姓中多有“苟避徭役、冒为僧道”者。但逃户依附禅林之例,禅籍中仅有蛛丝马迹可寻。这是由这部浮逃、隐漏与庇护的历史之特殊性所决定的。不过间接的证据却很有力:丛林的选址一般僻处深山荒野,利于隐藏逃匿,难以寻觅搜括;甚至许多丛林出现在州郡毗邻、勘界模糊之处,因为这样能够为依附的逃户提供在检括

或招诱之间应付裕如之机会,并可视为与地方官吏之间博弈(game)均衡的结果。

曹溪禅的名头实在太大,以至于很多人都可能有一种刻板印象,即岭南是唐代禅宗持续深入传播的重镇。但缜密的统计分析并不支持这种看法。不过到了晚唐,从泐仰宗的大安率僧众入闽开始,在南方内部,禅宗丛林的分布发生了一些颇有意思的调整。尤其乾符末以来丛林的分布即开始向中唐时期未曾深入的福建、岭南或是江西抚州等地扩散。这是因为在全国动荡不已、几无净土的大环境中,福建、岭南等地恰是少数安定区域。而活跃在这个区域的雪峰山义存禅师,抑或其及门弟子、开创云门宗的文偃禅师都是唐末禅宗的代表。

理论上,纯粹的、伟大的思想是超越于时、空的,是无远而弗届、亘古而常新的,但在现实中,宗教的传播范围,教众的活动却都跟一定的时空范围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本书关于中晚唐禅宗地理的考释,意图就在于研究这后一方面。

